



現代經濟叢書

要綱史學濟經

畢吉婁著
齊植璐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畢吉婁著
齊植璐譯

現代經濟叢書

經濟學史綱要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s, by K. W. Bigelow.)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日局

濟叢書 經濟學史綱要 (全二冊)

◎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K. W. Bigelow

譯者 齊植璐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海門路

總發行處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何霜筠
俞慶善) (一一五二七)

譯者小言

這一本小冊子是美國哈佛大學的青年教授畢吉婁 (Karl Warth Bigelow) 氏的傑作；它本來是歷史學家巴恩 (Harry Elmer Barnes) 所主幹的社會科學的回顧與前瞻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的一部，然自其獨特的個性和完善的内容上看來，却很值得抽出來單獨刊行。

雖然它是僅僅這樣薄的一本小書，却還有幾個特點，很應當向讀書介紹一下：

第一、內容簡要。它的分量雖少，但泰西各國所有的經濟思想，上自希臘、羅馬、中古及重商、重農諸派，下至古典、社會、歷史、心理、數理及制度諸派，莫不廣引博徵，網羅靡遺。且每敍一派一人之學，恆能提要鉤玄，深入淺出，以數語標示其神髓。故使非專治經濟思想之學者，讀之頗能以最小勞力，盡窺各家學說之堂奧。

第二、編制合理。該書編制脈絡分明，其系分類別，亦甚明確；尤以將新舊歷史及干涉

主義諸派併入崇實學派(Realists)、心理數理諸派歸入樂利學派(Hedonists)之見解爲獨到。

第三、材料新穎 該書出版雖久，然其取材頗不陳腐，對近代新興之全體主義(Uncialism)、制度主義(Institutionism)之思想，尤多闡發。

第四、態度公允 作者純係以理論家之眼光，介紹所有之經濟思想，其對各家皆有批評，但態度則至爲允當，不左右袒。且能數語褒貶，恰到好處，亦評亦述，趣味橫生，故其於讀者思想上之反應，自與戴有色眼鏡撰述之書籍不同。

第五、引證明晰 該書篇幅無多，但所引證之參考書籍，則頗不少，且每揭一書，必詳載其作者姓名，出版日期，出版地點，版刷次數；每舉一人，又必備述其生卒年代，甚至卽邈遠往古，亦無或遺。故不特對於一般讀者，能輔助其記憶及考證，即使專家讀此，亦頗能引爲索引，以作更深入之研究。

以上五點，乃譯者觀感所得，故儘先爲之介紹，至譯者觀察之正確與否，則讀者自有體

會，不必多述！

總之，此書據譯者看來，很稱得起「肝膽俱全，脈絡清晰」幾個字的評語。不管讀者是作錐子式的專門研究，抑作罐子式的普通涉獵，都可以滿足其適當的需要。所以在泰西許多經濟學史專家，如韓訥（Hanny）、殷格郎（Ingram）、史盤（Spann）、季特（Gide）諸人的長篇大著，都相繼介紹到中國來的今天，它還不致毫無立足之地。譯者這次敢於從事譯介者，也即在此。

最後，對於老師樊止平（弘）先生的修改和校閱，同學劉穎生、周均璞二君的繕訂和指正，都應在這裏附語誌謝。尤其是樊先生浴汗揮毫，扶掖後進的精神，更是值得篆諸心版感念無際的！

譯者經驗淺薄，率爾操觚，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尚希海內賢達，不吝指教！

一九三五年雙十節寫於嘉興客次。

經濟學史綱要目錄

譯者小言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斯密亞丹以前之經濟學說

第一節 希臘與羅馬之經濟思想

第二節 中世紀的基督教的影響

第三節 商業革命及重商主義

第四節 經濟學的出生——重農主義

第三章 古典派經濟學

第一節 古典派經濟學的建立——斯密亞丹

四〇

第二節 古典派經濟學的發展——馬爾薩斯李

嘉圖

第三節

古典派經濟學的傳播——老密爾沈尼

耶塞逸巴師夏加雷屠能及雷峨

第四節

古典派經濟學的集成——約翰·司徒雅

特·密爾

第四章

社會主義的潮流

七一

第一節

社會主義的產生——從聖西門到蒲魯

東

七二

第二節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高潮——從勞伯圖斯

到馬克斯

七三

第三節 馬克斯以後的社會主義

八七

第四節 無政府主義

八九

第五節 共產主義（布爾希維克主義）

九六

第五章 現代經濟學說之主潮

一〇一

第一節 崇實學派

一〇一

第一目 干涉主義及國民經濟學派

一〇一

第二目 德國歷史學派

一〇六

第三目 其他崇實學派

一一三

第二節 抽象論的復興——樂利學派

一二三

第一目 辯護的必要及樂利學派的出現

一二三

第二目 數理學派

二二六

第三目 心理學派.....二三

第四目 折衷派.....二三

第六章 經濟學的前途.....二三

附錄（本書參考書目選錄）.....二四九

經濟學史綱要

第一章 引言

『每一思想決不是單獨存在的』這句話，而今已成爲老生常談了一個新思想，姑無論其內容是如何新奇，然若不參證其所出生的精神的和物質的環境，仍不能通曉其真義。在另一方面，凡屬舊有的思想，又必有其光榮璀璨的歷史；所以要想對於現代的經濟學說，求一澈底的瞭解，則不僅要承認現代制度與事例的影響，即古代思想的影響，也未可忽視。研究古代的思想，頗能破除我人的淺見，庶不致將單純的再發現誤認爲新創見，如此才能啓發我人的謙虛的精神，及寬大的態度，而造成一聰明和公正的中庸主義。在本篇——經濟思想發達的概論中，筆者特別注意到那些，對於今日深得人心的諸概念，曾經直接的多少有些貢獻的思想。至於經濟的事實，祇在需要澈底理解一學說之時，纔加引證。此種範圍

的限制，乃因限於篇幅之故，但從許多觀點看來，皆堪惋惜！此種限制，更足以阻礙我人考察希臘以前的諸學者的著述，然此出發點在許多讀者觀之，都覺太早，而不覺太遲。〔註一〕

經濟學之成爲獨立而有系統的學說，雖始於十八世紀的重農學派〔註二〕，但經濟的思想，則在人類最早時代，即已存在。在遠古的各種記載：如野乘、詩歌、宗教及初民的思想之中，處處都可以發現其痕跡。至於其較晚近之進爲人類研究之一部門的發展，則可解釋爲係由古代思想家專心致志於研究人類行爲，與政治組織的普通問題的結果。自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有二現象，交相聯結，以促經濟學說之產生：其一，爲社會經濟元素之數量的與種類的增加，此種現象乃隨歐洲領土之擴張與商業革命以俱來，頗博得一般之注意，不待言。然此種商業及產業上之覺醒，在最初的時候，並沒有絲毫引起同樣的結果，所以較此猶覺重要之現象，乃人類中文字與知識之出現與進展。蓋此時神學倫理學政治學之舊有問題，對於彼等似已不復有『至大無外』的重要，彼等常欲專心致力於其他狹隘的問題，且亦能發表其一己之結論。其中最主要的，厥爲一般洞悉文藝復興以來具有重大影響。

的古代思想的，與通曉超越以前諸世紀的中古思想的學者，準此，欲明瞭重農學派以前各重要時代的經濟思想，則僅研討希臘與『煩瑣』(Scholastic)的哲學，或羅馬法與寺院法的思想，即可窺知其梗概。故我人之研討即從此始。

〔註一〕作者對於此處所代表之觀點，當負全責；但同時於哈佛大學教授布洛克(C. J. Bullock)與楊格(A. A. Young)二位先生之指導，頗表示無限之謝意。

〔註二〕出已成為普通的觀點，著名經濟學大家如杜步理(A. Dubois)於所著經濟思想史摘要(Précis de l' 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1903)中，季特(C. Gide)與瑞斯特(C. Rist)於合著之經濟學歷史(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4th ed., Paris, 1922)中，歷特(A. Oncken)於所著國民經濟學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2nd ed., 1920)中，施羅(O. Spann)於所著國民經濟學原理(Haupttheorie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2th. ed., 1923)中，均如此主張。但其他學者則多有推定經濟學之成立，乃蓋屬於塞拉(Serra)、蒙契雷將(Montchrétien)、墨(Mun)諸氏之著述者。

第二章 斯密亞丹以前之經濟學說

第一節 希臘與羅馬之經濟思想

在紀元前七世紀至五世紀之間，希臘曾經經過一次實際的商業與產業的革命，因此乃判然的脫離了農村家庭經濟的形態，而進入於新的階段；這種農村家庭經濟的形態，是曾被幾位作家誤當作古代典型的特徵看的。在許多城市的國家裏，農業雖則沒有失去其超越的地位，但已發展着一般的分工；其時食糧的輸入，已日趨普遍，輸出口工業，亦逐漸發達，活躍的外國貿易，藉着單純銀行家及高利貸者助力而日益進展了。然終是期以降，彼等頗有建造經濟學之希望的諸大思想家，却轉向於他途。〔註一〕概括言之，彼等方尋求美滿的人生的途徑。在這一種研究裏，主要的工作是研究與此問題有莫大關係的個人的行為，與萬能的國家之組織。當經濟的活動的必要性，已為世人所承認之時，在哲學家觀之，仍幾

無一顧之價值；肉體勞動在當時僅承認為自然的利用，〔註1〕及下流階級的事業，而為一般所不齒。同時，貿易及工業，則均委之於野蠻的異族與「新自由人」。最後，吾人所更不能忽略的，即希臘哲學家之視經濟的活動，不過為達到一善良生活目的的一個手段，因此，無論是在個人生活方面，抑在國家方面，為牟利而貨殖，皆被抨擊，認為是破壞自然均衡的致命之癌。因之，「中庸」與「均衡」二者，便形成為希臘思想的兩大支柱了。

在紀元前五世紀之中，詭辯學家（The Sophists）曾開始了一個心理上的紛擾及懷疑的時期。在此時期中，有二偉大的聖哲，屹然出現於希臘領土之內，為之澄清思想界的氛圍；此何人？即柏拉圖（Plato, 427—347 B.C.）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是也。這兩位哲人都是應當受後世經濟學家的注意的！柏拉圖的傑作為理想國（Republique），〔註2〕此書是描寫一個理想的共產社會的。在此共產社會之中，以自由民的天資及氣質的差異為根據，而劃分為三個固定的階級，並實行階級的分工和交易。兩個上層的統治階級，實行極端的共產主義，因為極端的共產主義，乃係抑制天然自私的個人，

以圖增進最高的全體的利益的最良手段。此外，在理想國書中之生活，崇尚簡單，公私財富崇尚公平，人口崇尚限制。協和及自足是他們永久所企圖的。柏氏並敍述了許多最可實踐的狀態，於其所著的法律論（*Laws*）一書之中：禁慾主義已稍緩和，然對於私有財產，則仍主嚴刻制限；牟利取息，亦受嚴重抨擊，但家族經濟——已經擴充而與有限制的交換相連貫——則被贊許。

柏拉圖之主張與其徒亞里斯多德正好處於極端相反的地位，蓋亞氏利用一種『歷史的哲學』的方法（Historical-philosophical method），而不喜用理想，但其師則擅用抽象及演繹的方法。亞里斯多德抨擊理想國甚力，然在其所著政治論（*Politics*）一書〔註四〕中，所略述之情況，除私有財產在此處得受贊許之一點外，在本質上與柏拉圖法律論中所敍述者，並無若何重大的區別。亞氏於政治論書中，頗注意於經濟的觀察，並認經濟學為實際哲學之一部門，立於與倫理學、政治學同等之地位。自亞氏始，『經濟學』（Economics）一辭，始被用為敍述『家庭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的科學，而此家庭管理一

科則包含自然物之獲取，所謂自然獲取，即利用自然的供給，以適應其生活需要之有限目的行爲。非自然的獲取，或爲賺錢而賺錢的行爲，特別是與那較爲複雜的經濟現象——如貨幣及交換——大體有關的行爲，則受排斥，尤以高利貸爲最。〔註五〕

此種對於取息行爲的反對，則由於亞氏雖已洞悉貨幣的其他功能，並承認其正當的用途，但對於貨幣之用爲資金的功能，則不能瞭解之故。亞氏更注意及貨幣的相對穩定性，且發見貨幣乃依其可以購買的財貨而有價值，並非因其本身的商品價值而有價值。亞氏又分別交換價值及使用價值，並敍明二者皆基於需要而發生，因爲效用實爲可供交換的財貨的通性。〔註六〕 彼仍相信實際的交換之所以發生，乃在『鞋匠的勞動量對於農夫的勞動量，和農夫的勞動量對於鞋匠的勞動量，發生同一的比率』之時。此主張似是一種『勞動費用價值說』(Cost-labor Theory of value)。〔註七〕 所以說價值的費用說與效用說(Utility theory)，發源都甚早，而此二者之調和，則是後代的責無旁貸的使命了。綜上所述，關於指明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傾向，以及對於自己尙未分析透澈之幾個主要的原